

後冷戰時期的東歐

—學術座談會紀要

本中心國際共黨組
本刊編委會

一、會議名稱：後冷戰時期的東歐

二、日期：民國八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星期五）下午二點至四點二十分

三、地點：台北市文山區萬壽路六十四號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新簡報室

四、主辦單位：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國際共黨組和本刊編委會

五、主席：林碧炤主任 記 錄：李玉珍

六、出席人員：

(一)邀請出席人員（以姓氏筆劃序）

王兆徽先生、尹慶耀先生、仇家彪先生、沈玄池先生、林祥瀚先生、吳玉山先生、周陽山先生、明驥先生、葛永光先生、潘錫堂先生、劉必榮先生、歐陽承新先生、戴萬欽先生、龔政定先生。

(二)本中心出席人員：

林碧炤先生、趙春山先生、蘇起先生、畢英賢先生、吳安家先生、董瑞麒先生、洪茂雄先生、陳鴻瑜先生、劉天均先生、王承宗先生、張台麟先生、湯紹成先生、龍舒甲先生、柯玉枝小姐、李玉珍小姐。

七、主席致詞：

謝謝各位參與今天的研討會。最近東歐變化很大，本中心舉辦此次研討會，就是希望各位專家就有關東歐的問題提出高見。今天會議流程是先由引言人作報告，在引言報告後，再請各位先進發表高見。會議討論事項經彙整後，將刊載於問題與研究月刊。因時間有限，現在就開始我們的引言報告。

八、引言報告：

龍舒甲先生：黨政現況

東歐各國自一九九〇年起分別步入追求政治民主化的過程，這本是件可喜的現象，然而一年多來，讓世人觀察到的，是種令人擔心的情勢；其間發展路程之崎嶇，也讓東歐人民備感艱辛與不安。茲就東歐國家黨政發展的趨勢、特徵與未來可能的發展提出一些淺見。

首先就黨政發展的趨勢而論：

一、從一黨走向多黨：在東歐各國為顯示其獨立自主性而相繼更改國號之後，人民民主專政與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也就無需再高掛張揚了。共黨本身為了取得人民的信任，除了更改其名稱外，也開放黨禁，並與各個新興政黨一起參與多黨民主制的選舉競爭。如：阿爾巴尼亞。

二、聯合政府的成立：東歐各國政黨不少，但組織規模並不算大，在競選時，即使較大政黨獲勝，却不一定能獨立組閣，因此，需與其他得票較多的黨派達成讓步與協議，組成多黨聯合政府，以求得人民的廣泛支持。如：捷克、波蘭、匈牙利。

三、權力結構的改變：在東歐各國民主化之後，國家的權力結構已非以往的蘇聯模式，除了黨政分開之外，原有的共黨權力已移轉到議會手中，並具有三權分立的制度。不過，共黨或左派勢力也會在議會中尋求獲得更多席次或權力，以牽制民主改革派的力量。如：波蘭。

四、民主法治的開始實施：以往東歐國家在共黨專政之下，憲法都是以保障其領導地位為主，但於開始政改之後，舊有的憲法多被修改或重新制定，於是基本人權的保障與法治概念的肯定均明顯獲得重視，尤其當共黨的領導地位去除之後，法律與秩序的局面已逐漸形成。如：捷克。

其次，以黨政發展的特徵來看：

一、政黨林立：東歐各國開始政治改革以後，各種大小政黨、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這些政黨性質與成立目的不同，大小不一，但是一黨獨大的局面已不存在，而多黨競爭的議會民主制概念也已產生作用。如：羅馬尼亞。

二、政黨間相互傾軋：儘管東歐各國都表示要實施西方式議會民主制，但因經驗不足，加上議會中缺乏強勢政黨，遂反而出現傾軋現象，並造成政局不穩。如：波蘭。

三、具有共黨背景的政治領袖多半難獲信任：東歐各國主要政黨或執政黨的領導人甚多具有共黨經歷背景，而以往受共黨迫害或壓抑的知識分子或其他階層人士，則因恐懼共黨死灰復燃，而難以相信這些領袖，因此要求與共黨劃清界線；相反地，農民或工人有時却反而支持這些領袖，因為他們害怕激進的改革措施會使他們完全失去了手邊僅有的生計。如：阿爾巴

尼亞。

四、反對黨多半不成氣候：若干東歐國家的反對黨由於力量太小，當面臨勢力與人數較大的執政黨時，往往難以抗衡，有些即使在聯合各黨成爲聯盟之後，却形成爲反對而反對的政治僵局，或是又發生內部分裂。如：波蘭。

五、經濟與民族主義的衝擊：東歐經濟力量脆弱，政府施政重點多半以經濟爲主，然而因人民缺乏耐性，使政府在設法穩定經濟困境時更見無力感。而民族主義興起後也形成爲揮之不去的陰影，種族間暴力衝突接二連三，政府除了窮於應付經濟問題之外，還得解決已經激化的民族矛盾，有些政府則完全被捲入於民族復仇之火而無法脫身。如：南斯拉夫。

最後，對未來可能的發展而言：

一、力求穩定是東歐各國優先的治國與施政目標。

二、自東歐非共化之後，所有的自由選舉都受到肯定，對推翻共黨統治後，民主化就能在短短兩年步入軌道，可謂難能可貴。

三、東歐經濟走向自由而開放的市場機能與推行私有化的速度對政治穩定足以產生決定性作用，而政府是否能夠控制通貨膨脹與失業人口的過高比率，以及冷卻過熱的民族復仇情緒與宗教偏見，也是影響政局的主因。

四、西方的經援若能有意義的持續進行，而不以提出一些緩不濟急的條件作爲交換時，將更能加快東歐政治朝有利而樂觀的方向發展。

洪茂雄先生：東歐民族主義問題

東歐國家「非共化」之後，最引起世人關注的一個問題，莫過於爲何民族主義情緒會那麼快速高漲？幾乎每一個國家都出現程度不同的民族主義紛爭。比較平靜的國家像波蘭，算是單一民族國家，境內僅有極少數的日耳曼民族，最近也出現過反德示威；最嚴重的如南斯拉夫，就引發一場慘不忍睹的內戰，弄得國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東歐國家民族主義之所以抬頭，究其原因，可歸納如下：第一，由共黨控制的國家機器全面崩潰。在新舊體制交替的情況下，一時尚難建立一套健全法治。過去，共黨均以高壓手段，化解民族紛爭，使得東歐的民族問題不致於受到外界的注意。第二，民族複雜，宗教信仰不同。南斯拉夫境內就有二十四個大大小小的民族，分別信奉東正教、天主教和回教，其風俗習慣、文化認同難免有所差異，易生誤會；保加利亞境內有十分之一人口是土耳其後裔，信仰回教，與保加利亞族信奉的東正教，自然格格不入。第三，社會自主性提升，人民敢挺身而出，爭自由爭人權。過去受歧視或擺佈的少數民族，爲維護本身權益，紛紛起來自組政黨或團體，形成一股政治力量，要求平等參與國家決策。第四，經濟發展失衡，國家資源分配不均。諸如塞爾維亞共和國境內的科索沃自治省，特別貧困，羅馬尼亞境內匈裔居住的村莊刻意重新規劃新市鎮，以及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間經濟發展的差異，因

而容易造成民族間的齟齬，相互猜忌。第五，歷史遺留下來的傷痕，記憶猶新。塞爾維亞族和克羅地亞族有過歷史上的深仇大恨，保加利亞人則長期受土耳其統治，斯洛伐克也曾受匈牙利人的控制下，這些歷史因素，自然也是當今東歐民族主義高漲的主因之一。

觀察最近二年東歐民族主義的發展，基本上反映了下列特徵：其一，分離主義盛行。東歐走向民主化之後，其發展正好和西歐相反。西歐國家正邁著穩健的脚步走向統合，東歐則走向分離，不但充當經濟一體化的機制——「經互會」，宣告瓦解，就是軍事一體化的「華約組織」也壽終正寢，而且南斯拉夫、蘇聯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等多民族國家亦先後解體。其二，地緣上的民族整合主義陰魂不散。這種傾向與分離主義不同，分離主義乃企圖從聯邦體制脫離出來，建立單一民族國家，而民族整合主義則因地緣上的關係，試圖與鄰近同一民族相結合，共同建立一個國家，如大塞爾維亞主義、大羅馬尼亞主義和阿爾巴尼亞共同體等，最具代表性。其三，反猶太主義再度出現。戰後東歐曾發生過「反猶」運動，最近一年來這種反猶太主義的傾向又再度公開化。這種反猶太主義的情緒，除了怪罪猶太人始作俑者，發明「共產主義」遺害人間，使他們受苦不盡，還對猶太人在經商致富壟斷企業的手法深表不滿。當東歐「非共化」後，又有一批一批的猶太人回到東歐，試圖索回戰後被沒收的財產，又想在政治上佔一席之地發揮影響力。凡此種種，導致某些東歐國家的「反猶」情緒抬頭。其四，排外事件明顯增多。東歐國家由計畫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的進程中，失業人口劇增，通貨膨脹居高不下，弄得人心惶惶，加上南斯拉夫內戰，大批難民湧進鄰近國家，因此，類似新納粹主義的排外運動，也應運而生，在波蘭、捷克和匈牙利等國已出現此類排外傾向。

東歐國家民族主義浪潮，無疑地，對此一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帶來相當嚴重的衝擊。最具體的事實即：第一，南斯拉夫民族主義的過度高漲，導致爆發民族間相互殘殺的戰爭。據估計，南斯拉夫這一場內戰，已造成近三萬無辜百姓喪生，二百五十萬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經濟發展停擺，其中光是財物損失高達上千億美元。若要恢復內戰之前的原貌，至少也得花上十年以上的功夫始能重建家園。第二，阻礙民主化改革進程。東歐國家歷經共黨四十年的恐怖統治，好不容易擺脫桎梏，正邁向民主道路。但民族主義過度抬頭，不但影響改革進程，而且也徒增內部民族間的矛盾，南斯拉夫的內戰即是最佳例證。同時，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裂也說明了民族主義的高漲，對捷克和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大步邁向市場經濟，也帶來負面的影響。第三，難民問題增添歐洲國家的困擾，又予新納粹主義可乘之機。成千上萬的東歐難民湧向西歐，尤其是德國，不僅對剛統一後困難重重的德國增加財政上和政治上的麻煩，而且也助長了新納粹主義氣焰。具體言之，東歐民族主義的抬頭，是因共產主義的衰亡而興起，但東歐民族主義的發展，又間接刺激了西歐極右民族主義的排外情緒。第四，南斯拉夫內戰，國際社會束手無策。南斯拉夫這個巴爾幹火藥庫，真是名符其實，一旦爆發，即難善後。歐洲共同體和聯合國都積極從中斡

旋，試圖消除爭端，但迄今仍未奏效。未來如何重建巴爾幹新秩序，將是聯合國或「歐安會」最棘手的難題。

總之，後冷戰時期的東歐，在民族主義的衝擊下，依然潛存某些危機，如未妥善處理，仍有升高的可能。諸如，塞爾維亞境內阿爾巴尼亞族居住區科索沃自治省，塞國政府奪得其自治權，取締阿爾巴尼亞語學校和阿語傳播媒體，已引起阿人極端的不滿，暴力事件頻傳，很可能是南斯拉夫第三階段的內戰衝突點。再者，匈牙利與斯洛伐克邊界亦潛伏重重危機，斯洛伐克境內住有六十萬匈裔，最近雙方即因多瑙河籌建水壩問題，公開爭吵，住在斯洛伐克的匈牙利族也想歸併到匈國版圖；其他如羅馬尼亞境內有一百七十萬匈裔，摩爾多瓦共和國有近百分之七十的羅裔，他們都有意無意地公然表示相互聲援。由此以觀，後冷戰時期的東歐，民族主義問題依舊是東歐不穩定因素之一。

畢英賢先生：東歐私有化現況

東歐各國在完成政治民主化之後，所面臨的最重大任務就是，在經濟體制上從國家社會主義過渡到市場資本主義。一般認為，這個任務的核心就是「私有化」。事實上，私有化並不是構成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因為，一個有效的經濟過渡綱領，尚應包括：物價自由化，降低政府對企業和外貿的控制，建立可兌換的通貨，降低通貨膨脹的宏觀經濟穩定化綱領，建造資本主義經濟所需的法律及調節結構，徹底改組銀行信貸制度，建構社會保險綱領等。不過，毫無疑問，私有化是最艱難和最複雜的工作。

私有化的目標

國有財產私有化政策的擬定旨在達成若干目標。不過，東歐各國私有化的目標不盡相同，有時甚至相互矛盾。不過大致可歸納為左列幾點：

一、私有化的戰略必須易於快速有效推行。為此，必須考慮幾個問題：(一)公有財產出售前，必須妥善評估其價值；(二)對購買國有財產者的法定權利必須明確規定；(三)使投資者相信，政府私有化綱領是可靠的。

二、私有化把財產權轉交給私人，使其控制並對這些財產負責作較佳的使用、管理和保管。

三、私有化力求公正。因此，私有化必須由國家領導；使出售國家財產的收入達到最大限；國家財產的分配儘量廣泛、儘量民主。

四、私有化可導致宏觀的經濟穩定性。在私有化的過程中，個人可以用現金購買資產，這可減輕因人民擁有過多的現金而造成的通貨膨脹壓力。

五、私有化有助於民主發展。私有化將製造一個中產階級，這個階級最願意維持和擴大政府的民主形式。

在東歐國家中，私有化的戰略各不相同，大致有下列數種：大私有化，自發性私有化，小私有化，資產私有化，工人所

有制，原有私有部門的擴大。在實踐上大致有三個途徑：拍賣，給予經理和工人，廣泛分配股權。

各國私有化的現況

將東歐各國私有化進展的情形簡述於後。

一、阿爾巴尼亞於去年六月實行土地私有化；並曾試圖在中小企業方面推行私有化，但效果不佳，困難重重。國營大型企業私有化尚不知何時才能開始。

二、保加利亞的私有化起步較晚，但具較大市場特性。今年四月二十三日保加利亞始通過「私有化法」。據西方評估，這個私有化法比東歐其他國家所通過的私有化法更具市場特性。按照這個法律，小企業將拍賣；大企業將逐漸轉化為聯合股份有限公司，並對外國資本開放，但各個企業股權的百分之二十將優先賣給原有員工。出售國家企業所獲得的國家收入將作如下的分派：百分之三十作為社會基金，百分之四十償還外債，百分之二十用以賠償原產主，百分之十用以發展農業。

三、捷克斯洛伐克的私有化最平穩，分別以小私有化與大私有化計畫進行。一九九一年開始實行小私有化計畫，將近一萬多個商店已完成私有化；關於歸還曾被沒收的土地和財產的法律已經通過。今年初，關於三千個國營企業的「大私有化計畫」已經完成。八百六十萬人（成年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已辦妥手續參加大私有化計畫。按計畫，每個公民可以買一本憑單（付一千克隆，約值三十三美元），憑單可以用來向國營企業、也可向私人公司投資。捷克與斯洛伐克兩國決定明年各自獨立，這個大私有化計畫的實行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四、匈牙利是東歐各國中私有化發展較快的國家。匈牙利所實行的是「制度化私有化計畫」，含三個要項：（一）自發性私有化計畫：企業經理可以主動出售企業或參與企業的出售；另一方面，投資者也可不經過企業，向國家申請購買。（二）先期私有化計畫：將一萬多個小企業，如商店和餐館拍賣或出租；（三）計畫私有化：即計畫出售國家所擁有的大型企業，但至今尚無具體執行辦法。去年，匈牙利的一千八百個國營企業中，百分之十已完成私有化。匈牙利所吸收的外資占西方在東歐投資總額的一半以上；去年，匈牙利的合資企業已達八千七百家。

五、波蘭的私有化是「震撼治療」的一部分。一九九〇年，波蘭實行經濟改革，其中措施之一就是私有化。起初，波蘭實施「小資本私有化」。去年，約有八千個企業已納入私有化過程，其中也有一些大型公司。另一方面，波蘭已開始消除國營中、小企業。今年，波蘭企圖實施「整體私有化」（mass privatization）計畫，把四百個「最大與最好的工業企業」改為私有。此一計畫在今年上半年一度被擱置；不過，波蘭新總理將重新推動，俟「整體私有化法」通過後實行；約有三十個企業在年底之前售給西方。

六、羅馬尼亞私有化剛剛起步。去年八月羅馬尼亞已經通過關於私有化的法律，不過到今年九月底十月初才開始運作。

現在，準備工作已大抵就緒。按照規定，百分之四十七的企業資本財保留為國家所有，使政府對經濟控有「戰略性的機制」。不過，私人公司發展甚快，據今年二月羅馬尼亞的資料，羅馬尼亞現有二十多萬個私人公司。

七、南斯拉夫民族衝突，使私有化不易實施。南斯拉夫在八十年代底，比任何東歐國家容易實施私有化。但是，從去年民族武裝衝突以來，南斯拉夫已一分為五個獨立國家，波斯尼亞戰火未停，各國經濟面臨不同程度的危機，一些國家已提出私有化計畫，但皆難以推行。

私有化的難題

在私有化過程中，東歐各國大多遭遇左列全部或其中大部分的難題：

一、資金不足：東歐各國皆缺乏資金，私有化又需要大量資金。除匈牙利對外人參與私有化沒有設較大的限制外，東歐其餘各國對外人的參與大多設限較嚴，因而加重了私有化的困難。

二、私有制度尚未健全：欲加速私有化過程和人民對私有化的信心必須先使所有制度上軌道。此點，在短期內不易做到。

三、缺乏人才與專門技術 (know-how)：國營企業私有化，必須先擁有一批精通市場經濟的經理人才與管理技巧；東歐原有管理人員在這方面都不適任，再訓練則非短期內可以完成。

四、政府不穩定，政策難貫徹：東歐非共化和民主化之後，政府權威削弱，政府改組頻頻，任何政策皆難貫徹。

五、經濟惡化，社會不安：近兩三年來，東歐各國經濟持續惡化，普遍高度負成長，惡性通貨膨脹，失業率急速上升，生活水平下降，社會治安惡化，人心浮動。在這種情形下，進行大型私有化，不僅受到物質條件，而且受到心理條件的不良影響。

六、無先例可循，必須摸索前進：在全世界的經濟學理論中，沒有任何關於從社會主義經濟向私有制經濟過渡的學說，更沒有這一類的先例。各國不得不採行「試誤」的途徑，摸索前進。因此，東歐各國的私有化過程都不很順利，困難重重。湯紹成先生：東歐非共化後的社會變遷

若以東歐各國（前蘇聯除外，但前南斯拉夫包括在內）整體觀之，不論其經濟發展的水準或是生產力，均以波蘭、捷克與匈牙利等三國，較為先進。而可能與此有關的另一現象，即上述這三國在非共化後的自由選舉中，共產黨或其後繼者，所獲得的選票，平均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之間，而其它如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中的各小國以及羅馬尼亞等國的共黨，則在選舉中獲得高票，甚至獲得超過半數的國會席次。本人僅就波、捷、匈三國的社會變遷提出報告。

(一) 心理上的適應：由於以往共黨政府的高壓政策，以及目前執政者的行政能力（雖然這些政府領導人受到人民的同情與

支持，但是他們是否能夠順利地運作這部國家機器，值得懷疑），使得老百姓對於政府的信心不足。若以人民的民主經驗而言，目前六十歲以上者，才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認識到了初級的民主制度以及其運作方式，大多數的人民群眾，對這種自主性的新制度，都感到陌生。再加上經濟的自由化，人們對於競爭的不適應，多感缺乏保障與安全感。實際上，原本國家的社會保險制度，現多轉由私人辦理，好壞差異以及保險的程度，各有不同。以其原本被動、等待國家的處理、缺乏工作紀律以及不守法的特性而言（這些特性乃所謂 Homo Sovieticus 的內涵，是由共產制度所造成的），為適應新的環境，實在有很大的困難。由一問卷結果顯示，目前一般人民對於軍隊、警察與教會較為信任，而對國會與政府反而較不信任，如此可略窺民心之所向，因為前者有助於社會的安定。

(二)社會的變遷：因為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改變，社會上有不少的人淪為貧民，他們生活在很低的生存條件中，這些人包括被工廠裁員者，被釋放的政治犯，意識形態的工作者（如馬、列主義的教員及特務等），他們均因無特殊技能或無一技之長，而被新的社會所淘汰。

反之，少數獲得外資支援的科技人員或個體戶等，收入較高，因而逐漸產生貧富不均的現象。因此，社會上的犯罪率增高（平均三到五倍於非共化以前的狀況），再加上人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新鮮感，各種色情行業泛濫（許多其它東歐國家婦女到波、捷、匈三國淘金），賭博猖獗，社會一般亂象尚未就緒。

龔政定先生（外交部歐洲司司長）：我國與東歐國家關係現況

東歐國家自採取政經改革措施，朝民主化與市場經濟體制之方向發展以來，我國即針對各國政經改革發展情形與東歐各國建立新關係，並採取一連串措施，如東歐國家人民來華簽證手續均比照自由國家人士辦理，全面開放東歐各國為直接貿易國家，並均可享受我國第二欄優惠關稅，東歐國家可向我國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基金申請貸款援助。

為有效運用我國現有人力物力，在推動與東歐各國關係過程，即優先選擇政經發展較穩定之匈牙利、捷克與波蘭等三國為重點國家。我國首先於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在匈京設立「臺北商務辦事處」，兩年來中匈兩國往來密切，我國復於八十年七月初與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達成協議在兩國首都互設代表機構，並於八十年十二月在捷京布拉格設置「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又我國於本（八十一）年七月與波方達成協議在兩國首都互設代表機構，可望本（八十一）年年底前在波京設置「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匈、捷、波三國迄今尚未在台設置代表機構，但皆表示將來華設處。除匈牙利、捷克、波蘭三國外，東歐其他國家如保加利亞及自南斯拉夫分裂出來的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等國，我國亦有高層接觸，保加利亞總理夫人 Dr. Elena V. G. Dimitrova 曾於本年一月來華訪問，保國交通部第一副部長 Mr. Kiril Sadonkov 曾於本年三月來華與我簽訂中保空運協定，為我國與東歐國家所簽第一個官方空運協定。斯洛維尼亞科技部長 Mr. Peter Tancig 曾於本年六月

率團訪華。東歐國家脫離共黨統治恢復民主後，對我國普遍具有好感，對我國經濟力量雄厚尤感羨慕，惟我國在推動與東歐國家關係過程中，發現東歐國家經過四十餘年的共產隔離，對我國瞭解不多，尤其基層民衆對我國仍感陌生，加以南韓數年前積極爭取東歐國家不惜承諾提供大量經援，使東歐各國誤認我國亦可提供巨額經援。

但我國發展與東歐國家關係，所遭遇最大困難仍爲來自中共方面之壓力。中共多年來在世界各地封鎖我國外交活動，在東歐地區亦不例外。中共與東歐國家原皆有外交關係，東歐國家民主化後，中共仍全力維護與鞏固原有之關係，甚至新近自南斯拉夫分裂之國家（如克羅埃西亞及斯洛維尼亞），中共皆積極與各該國建立外交關係並派使設「館」，在與各該國簽署建「交」公報時，除重申其爲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及台灣爲中國之一部分外，並要求各該國不得與我國建立官方關係。

波羅的海三國在地理上屬北歐，但由於受蘇聯共黨統治四十年，所以目前暫時仍列入東歐範圍。波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民國八十年八月脫離蘇聯恢復獨立後，中共於十月間即與該三國建立「外交關係」，我國爲爭取波海三國，本部章次長特於同年十一月訪問該三國，分別與該三國簽署設立代表機構之協定。本（八十一）年元月章次長再赴拉脫維亞訪問，與拉國達成協議，提昇我國代表團爲總領事館。我國駐里加總領事館並隨即於二月正式成立。自我國在拉京里加設立總領事館後，中拉雙方往來密切，台北市黃市長、本部房次長及經濟部江次長本年四月、七月及九月已先後赴拉訪問。

拉國方面，拉國女子籃球隊亦於六月間來華參加瓊斯杯籃球賽，經濟改革部長卡寧斯 Amis Kalnins 於七月，拉總理高德曼尼斯 (Ivars Godmanis) 率外交等部長於九月來華訪問，並與我國簽定「中拉投資保障協定」及促進觀光「意願書」。拉國元首戈布諾斯 (Anotolis Gorbunos) 在本年九月聯合國第四十七屆大會曾發言表示我國應重返聯合國，爲唯一發言支持我國之歐洲國家，難能可貴。

愛沙尼亞、立陶宛兩國，本部章次長於去年十一月訪問時曾分別與該兩國簽訂互設代表機構協定及經濟合作備忘錄。其後，我國與該兩國亦有往來，本部房次長於本年七月訪問該兩國，曾與該兩國高層人士交換意見。該兩國除曾於本年八月參加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舉辦之「進步伙伴展」外，立陶宛前總理瓦格諾斯並曾於八月間訪華。

九、自由發言：

主席：因時間非常有限，我們現在就進行自由討論。自由討論我們過去常採用的二種方式是：(1)對引言報告之內容提出問題；(2)對所列的討論題綱有高見的；都歡迎各位先進提出高見。

劉必榮先生：個人贊同湯先生所提的，在高壓統治結束後，容易引發個人適應問題。

一九九〇年我到波蘭訪問時，遇見一些天主教神父，他們表示，目前守法是很大的問題，他們想用宗教力量來約束這些

沒有守法觀念的人。湯先生的報告中似乎沒有提到宗教在這方面的作用。

洪茂雄先生：個人於去年也曾前往東歐，印象最深刻的是宗教。在那裏宗教活動越來越頻繁，進教堂的人越來越多，而西方教會對東歐的教會也都施以援手，這可能對剛走向民主道路的東歐社會大有幫助。

在波蘭，天主教的勢力相當龐大，現任教宗又是波蘭人，對波蘭影響很大，使波蘭走在民主化的前頭。

趙春山先生：可否提一個程序問題？今天難得有機會請到這麼多專家到場，是否可向主席建議，請各位專家先作發言，最後才由引言人回答問題。

主席：最初設計這份討論題綱時，有兩個大的方向，在這裏向各位報告。首先是研究這部份，如理論建構、專門機構的設立、教學部份，或建立學術交流等方面；其次是在實務交流上，如何與東歐國家發展關係、投資、雙邊空中航運等實質問題；各位專家可提供建言，讓我們向其它單位轉送。

沈玄池先生：基本上，資本主義、自由企業制度與市場經濟這三個名稱的意義是一樣的。自由經濟社會中一切經濟活動的進行有賴於價格體系的存在，而價格基本上是受貨物的供給與需求的變化而決定的，在供給與需求相互配合情況下，帶動經濟發展。東歐國家在過去計畫經濟時代，不論是貨物的價格或是供給量均由政府制定，可說完全扭曲了經濟活動的動力。今日，這些國家的經濟改革即是想讓市場自由的供需來帶動經濟繁榮。不過，由於受到下列幾項條件的限制，却使這項改革不易成功。

(1) 生產力低落問題。東歐國家的人民，迄今在工作時仍存有「吃大鍋飯」心理，比較上，大部份的人都沒有西方國家人民的勤奮，加上機器老舊、生產技術落後，因此，不論是農業或工業的生產均十分低落。影響所及，貨物產量不足，在國際上沒有競爭力，甚至引發惡性通貨膨脹等嚴重問題。此乃最根本的經濟問題。

(2) 惡性通貨膨脹。由於生產力低落、產量不足、需求多過於供給，東歐國家一般又十分缺乏外匯，無法自國外進口以資補充，加上國家不再嚴格管制物價下，產品的價格急劇上漲，造成嚴重通貨膨脹。影響所及，抵銷了大部份人辛勤工作的成果，從而引發普遍的不滿情緒，造成社會與政治的不安。

(3) 資金短缺問題。東歐國家由於生產力落後，產品在國際上沒有競爭力，因此十分不易累積發展經濟所必需的外匯。在國內，由於通貨膨脹腐蝕了國民可能的儲蓄，而使發展經濟的資本不易累積。在國外，由於債信不佳，使西方國家的銀行不願提供信用貸款。另一方面，由於社會動盪不安，也影響其它國家的投資意願。上述情形影響所及，生產設備、技術無從改善，生產力無從提昇，而使東歐國家的經濟發展陷入惡性循環中。

(4) 分配不均問題。最近幾年來，東歐國家競相實行所謂的「私有化政策」，其途徑有：向全體成年公民無償發放產權券

，鼓勵原企業職工購買該企業產權券，成立互助基金公司協助個人購買企業，鼓勵外資購買企業等。由於一般人的儲蓄有限，政策的推動流於形式。在私有化過程中，原共黨的特權階層常能運用其關係，成為私有化的受益者，分配並不平均。

(5) 經濟合作失調問題。在東歐，尤其是在昔日蘇聯境內，由於帝國解體的結果，分成十餘個經濟區域，在主權意識高漲情況下，影響彼此的經濟合作，使原有的工業、農業原料來源均成問題，影響經濟發展。

(6) 高失業率急劇上升，亦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影響經濟發展。但在推行自由經濟制度時，許多不具競爭力的產業難逃被關門的命運，因此失業率急劇上升。

(7) 政治制度難配合經濟改革。東歐國家如欲成功地走向市場經濟，則在國家金融、財政、運輸，以及一般行政系統方面均需配合。迄今，這種配合仍然不足。

仇家彪先生：個人對東歐經濟前景非常悲觀。可從以下幾點來說。

(1) 一九九〇年十月德國統一時，我在柏林與當地工商社團會談，他們認為三、五年內，德東經濟可以穩定，也許七、八年，雙方就可達到同一經濟水準。但現在的情況却不是這樣。德東僅一千六百萬人口，佔德國土地面積三分之一，却已讓德國聯邦政府焦頭爛額。

德國政府一年要花一千五百億馬克，並成立專門機構去協助東德企業私有化，德國政府原估計需要六年改善德東企業的體質，而現在的估計則要十年。

為了對德東巨額的支出，德國亟需資金，故堅持維持高利率，以吸引外來資金，造成英鎊危機及里拉危機，引發愛爾蘭、西班牙恢復外匯管制。僅為了德東即引起西歐的貨幣危機，影響及歐洲整個的經濟發展。可見歐洲共同體經濟貨幣的整合前景，不如原先預料的樂觀。進一步來說，由於歐洲及美國目前都面臨經濟衰退危機，缺乏資金以支援東歐的經濟重建，因此我的看法是在未來十年內，東歐的經濟發展前景，困難重重。

(2) 從另一角度來看，東歐國家中在經互會時期開發程度越高（工業化程度越高）的國家，其復甦的工作越困難，德東即為一例，其重化工業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已使有些工廠惡化至無法收拾的地步，而匈牙利因農業及輕工業較發達，目前它的私有化進度較佳，因而越是較落後的東歐國家，在重建時似乎也較容易。

(3) 東歐國家嚴重缺乏資金，目前全世界只有日本、德國、台灣因享有大量貿易順差而有充沛資金對外投資。如今，日本經濟也不景氣，德國的資金大量投入德東，而台灣的資金則投資於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目前歐洲、美國都面臨經濟衰退，自顧不暇，因而東歐的私有化再怎麼努力，在缺乏資金的投入的困境下很難在短期內有成功的希望。

董瑞麟先生：因時間有限，我個人僅就私有化程度較高的捷克、波蘭、匈牙利的私有化狀況，提出一些淺見。

在廿多年來的經濟改革過程，三國已先後允許個體從事經營小型企業，尤其是服務業。共黨垮台後，更將國有的私人企業、土地（捷克限百分之七十）和其他資產退還原主；同時將小型國營企業以直接議價、拍賣或股份制形式進行私有化。目前小型國營企業大致有一半已經完成私有化。

而大中型國營企業私有化，三國正計畫採取不同的辦法。

一、捷 克

捷克計畫將四、八〇〇家國營企業，挑選一、二千家在今年進行私有化。辦法有二：一是直接銷售給國內外投資者；二是找不到買主的企業，則公開拍賣企業的百分之四十至八十的股份。每位捷克人均發給股權憑證，持有憑證公民在繳納約半月薪水的拍賣登記費之後，就可參加拍賣大會購買企業股票。而不論股權憑證或股票，均可立即轉讓，所以便可逐漸形成一個股票市場。

二、波 蘭

捷克採取繳納拍賣登記費方式有償分配股票，波蘭每位公民都可無償分配到股權憑證，但必須將憑證交給不同的共同基金、開發銀行、投資顧問代為管理運用，由他們來標購全國一百家最大企業的百分之三十股權，而剩下政府所保留的百分之七十股權也交給他們管理。他們可買賣股票、與外商組織合資企業，甚至可宣佈企業破產、讓生產要素流動。經過相當時期，資本市場建立之後，才允許個人轉讓代為托管的股權憑證。

三、匈 牙 利

匈牙利因進行市場化較早，外資企業較多，相信可以成功地賣給國內外投資者。計畫在一九九三年前能賣掉五、六百家效益好的國營企業，一九九六年完成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國營企業民營化。

這三個國家正從以公有制為主的經濟體制，過渡到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多種所有制並存的混合經濟。由於國內資金短缺，外人對其改革前景不樂觀，目前進行私有化成效還不大。

吳玉山先生：(1)在東歐，如同在開發中國家，面臨三大問題，即民族問題、民權（政治）及民生（經濟）問題。

(2)這些問題可以一個個發生，或同時發生。如果同時發生，國家可以採兩種方式解決：一為一次解決一個問題，同時用國家強力壓抑其它問題；一為同時解決多數問題。如要一次面臨多數問題，則政治系統容易超載。

(3)東歐在一九八九、九一年，同時經歷民主革命，國家強力（威權或極權）因而消逝，故順序解決（一個一個解決）的可能性不存在。同時要面對好幾個問題。

(4)此時有兩類型國家：面對三個問題的（蘇聯、南斯拉夫及捷克斯洛伐克）及面對兩個問題的（匈牙利、波蘭、保加利

亞、羅馬尼亞)。兩個問題有可能轉成三個問題，如保加利亞參加對馬其頓的爭奪，或匈牙利為斯洛伐克境內匈人和斯洛伐克交戰。

(5)在第一類型國家，民族問題不解決，其它（政治、經濟）問題無法解決。因為民族問題情緒最高，民主政客必加以利用；同時民族問題不解決，國家版圖不定，政經改革亦無法實行。故捷克斯洛伐克未分家改革無法推行。俄羅斯經改必待蘇聯解體。而南斯拉夫在內戰下，改革亦無可言者。

(6)在第二類型國家，政治經濟改革原有二途徑。蘇聯是政治改革先，而經濟改革後。大陸是經濟改革先，而政治改革後。今因政治改革已產生，大陸之途已不可能。東歐在民主制下實行痛苦經改，必要使政治成本能為執政者所負擔。此時有二種可能：一為震盪治療；一為和緩改進。波蘭、東德及蘇聯屬前者，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屬後者。前者基本上是新權威主義，方法是穩定金融（壓抑通貨膨脹）、放鬆物價（改進貨源配置效率）、私有化。波蘭在 Balcerowicz 主政下，歷經馬佐維茲及華勒沙的前半期，後終因經濟衰退而下台。其餘各國亦無可觀。

(7)最佳經改組合：威權主義，和緩改革國營企業。

仇家彪先生：大陸的儲蓄率已達百分之二十四，即是資本的累積。一九九一年，大陸貿易已佔其GNP的百分之三十三，已是外銷型的經濟。

周陽山先生：東歐當前的民族主義現象，大致上可分為下列幾種類型（其中有許多例子是包含多種類型的）：

(1)由民族仇恨衍發民族戰爭。其中以南斯拉夫為代表。

(2)由分離主義掀起民族對立。包括科索夫省的阿爾巴尼亞人與塞爾維亞人，及捷克與斯洛伐克人之間的對立。

(3)由民族國家主義而成立新的國家。其中包括目前已獨立成功的斯洛伐尼亞、克羅地亞、馬其頓，以及前蘇聯的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波羅的海三國等。另外，斯洛伐克也即將完全獨立。

(4)因同文同種而擬併入鄰近國家。此即洪茂雄教授所提到的「民族整合主義」，其中包括摩爾多瓦（考慮與羅馬尼亞合併）、科索夫（阿爾巴尼亞民族主義者準備與阿國合併）。但這些擬議迄今並未成功。如果處理不當，很可能會衍發民族戰爭。

(5)區域性的民族分離主義。由於民族複雜，此一現象普遍存在東歐各地。其中包括摩爾多瓦境內的俄裔獨立運動（成立涅斯特共和國）、烏克蘭境內克里米亞半島的俄裔分離運動、羅馬尼亞境內的匈牙利裔回歸故國訴求，以及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境內的土裔、希裔問題。

(6)排外性的民族主義。其中包括波羅的海三國的排俄、排斯拉夫裔的趨勢（以愛沙尼亞最為嚴重），波蘭境內的反德裔

趨勢，以及各國普遍出現的反猶運動。

上述六種民族主義現象，對東歐的民主發展及經濟成長已造成十分負面的影響，而且迄今尚未有消弭和緩的跡象。這與西歐的統合運動相較，的確凸顯了東、西歐之間嚴重的民族、文化差距。也顯示後冷戰時代的最大危機之一，就是民族主義風潮之下的對立與紛爭。

葛永光先生：個人曾兩度造訪東歐，想提出一些訪問觀感。首先就國際環境來看：

(1) 南斯拉夫目前的內戰可能波及鄰近國家，如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亞等，東歐其它國家擔心萬一被捲入戰事時，需要聯合國的支持，因而也需要中共的支持。因此，東歐國家對中共的主要忌諱來自它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的身份。

(2) 面臨複雜的種族問題。南斯拉夫的戰爭與東歐其它國家多少都有點關係，匈牙利關心南斯拉夫境內的匈牙利人的處境，保加利亞則注意馬來其頓人的態度，而波士尼亞的回教人口的遭遇，則可能牽連土耳其的干預，因此，南斯拉夫的戰爭如擴大，很可能會成爲一區域戰爭。

(3) 東歐在民主化之初非常希望得到西方的支援，但抱怨西歐、美國的支援不夠。因而他們開始想尋求亞洲國家的支援，對新興的工業國家如中華民國、韓國等興趣濃厚。

其次就東歐國家所面臨的內政問題：

(1) 東歐多半處於民主轉型的初階，民主基礎薄弱，對民主的認識十分有限，因而面臨學習民主的需要，即有東歐的官員表示要跟台灣學習民主發展的經驗。因欠缺民主運作的經驗，民主政治文化亦未成熟，如缺乏妥協、容忍的精神，使政黨內爭激烈，如匈牙利、保加利亞等，造成內政不穩定。

(2) 共黨殘餘勢力的潛在影響力仍不可忽視。保加利亞共產黨改名爲社會黨後，仍佔有國會近百分之四十的席位，其它如匈牙利的社會黨雖然勢力不那麼龐大，但其對全國政策的影響力仍在。因而共黨雖然下台了，但改名後其影響力仍然存在，對國家的外交政策仍有牽制。如保加利亞欲與我國發展關係，必然會顧慮到其佔有百分之四十國會席位的社會黨的反應。

(3) 在經濟上，東歐國家貧富懸殊的差異出現，造成階級的對立。倒台後的共黨領導幹部，有些雖進入監獄，失去政治特權，但有很多人在經濟上變成富有的階級，成爲特殊的現象。私有化除了在波蘭、匈牙利見到一些成效外，其它國家都還不算很成功。

(4) 在社會層面上，失業問題嚴重，有些國家希望我們引進他們的勞工。東歐一些國家的重工業發達，有爲數不少的技術工人。

前瞻中華民國與東歐的關係，有很大發展的空間，就意識形態來看，他們是反共的，與我們較親近，排斥中共；然就現實

政治而言，他們必須與中共維持適度關係。他們特別希望我們對現在東歐執政的民主人士多加支持，因為他們現在的根基都很脆弱，這些民主人士一倒，社會黨會不再掌政權也很難說。支持東歐國家的民主人士對我們的國家利益必然較有幫助。

歐陽承新先生：東歐與獨立國協經濟改革的困境與化解之道，牽涉政治、經濟、民族、社會等多個層面的因素互動與力量消長的複雜關係，不能從純經濟的角度設想或評估。處理這個問題不僅要建立正確的理論方法，確定問題的歸類，其關鍵標準的取捨，如前面幾位發言者提到威權體制的控制與變法改革在運作上的配合，在問題性質上就已超脫了慣常假定既定制度結構不變的前提，但亦不能否認體制的改造與模式的選擇仍有不可違抗的經濟學理，在談這兩個問題之前，我們可先就現象作一擇要的印證。

(1)自一九八九或一九九〇年以來，東歐與獨立國協總體經濟動能嚴重衰退，產值大幅滑落，其下降的幅度平均介於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嚴重的像德東、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更超過百分之五十。這一現象，比之三〇年代西方經濟大恐慌，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外，各國平均失業率逾百分之十，通貨膨脹，政府預算赤字，以及國際收支失衡等惡兆，使得各該國家試從計畫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的努力，受到嚴重挫折。所幸這一地區在國際經濟活動的比重不高，以致沒釀成全球性的災難，但對處於蕭條的世界經濟無異雪上加霜。

(2)東歐與獨協經濟衰退的最主要原因是原經互會集團解體，以及蘇聯瓦解，兩者對本區產值下降的破壞作用就佔了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一的作用成因包括：歐市市場開放緩慢，特別是歐市對波、匈、捷三國具競爭力出口產品設限，東歐內部產業結構轉型發生斷層，不能提供適銷對路的产品等，以及國際資金短缺，使得西方工業國無力支援東歐經濟，造成世人對東歐經濟普遍悲觀，前景黯淡的印象。不過因背景和經濟條件不同，各國的命運也有很大的差距，且在繼續擴大之中。

(3)就各國之國內情勢而言，失控的市場化改革使得貧富差距擴大，所得分配呈現兩極端，其中又以獨協中產階級幾乎完全消失最為嚴重。飽受戰禍的新南斯拉夫的月平均工資目前已降至七〇〇八〇馬克，是過去的十分之一。情況正常的匈牙利職工一般都兼兩、三個工作，至於和匈牙利情況類似的捷克在所得下降後，由於物價獲得控制，匯率穩定，其實質所得已逐漸回升。不過有鑑於捷克和斯洛伐克兩邦分裂，情勢又將惡化。因為近一年的發展顯示，儘管匈牙利吸引投資一向屬東歐各國之冠，約佔全部外人直接投資的百分之六十，但捷克已有後來居上之勢，今年待審的外人投資額就有五十億美元，倘分裂成真，政局喪失安定，初步穩定的捷克經濟又將失衡，而以軍火工業著稱的斯洛伐克更將受到嚴重打擊。

個人覺得，東歐和獨協的經改障礙有其一定的前提，這個前提是原蘇聯瓦解，使得該一地區在一夕間變色，全東歐同時進入政經結構劇烈震盪的不穩定期，這是屬於外部的不可抗力。問題是，儘管如此，東歐國家在經改模式上並不是全無選擇的空間：

(1) 以德國快速統一為例，一九九〇年四月，聯邦德國宣佈按一對一的東西馬克匯率，允許德東人民按嚴重高估的東德馬克交換西德馬克，就是一種錯誤的政策。同時以德東勞工平均生產力僅及德西三分之一的比例，聯邦政府基於政治安撫及防止勞工西移的策略，變相追加工資，並比照德西的勞工福利，又是一種錯誤。祇此兩樁錯誤，造成德東所得與實際生產成本和比較利益逆反的扭曲效果，以及聯邦政府的財政負擔，使得聯邦政府超激進的市場化經改不能奏效。至於企業私有化需求不斷，加重治德東環境污染的成本，造成投資者的負擔。同時，私有化的業務繁重，負責推動這一政策的 *Treuhand* 在政策的執行上為求公平却喪失了行政效益，造成產權訴訟競爭不斷，增加了不確定性，也影響德西和外人投資。凡此種種都屬於技術上的錯誤，而非外在的不可抗力在作祟。

(2) 歸根究柢，戈巴契夫領導下的蘇聯經濟一蹶不振，而獨協取代舊蘇聯，造成邦國分裂，原共和國祇能自求多福，為追求一己的片面經濟利益，相互抵制和衝突。至於早期在改革模式的選擇，則是出自戈氏「重歐輕亞」的意識，這是俄國厲行現代化、居主導的西化派繼十七世紀彼得大帝師法西方後的又一次勝利。然這一次並不成功。戈氏初則輕信歐美國家的援助承諾，主動拆解了原有的威權體制，但不能正視乃至輕視中國大陸經改的成就，下意識或認為中共早期以蘇聯為師，才建立了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體制，蘇中（共）應是師徒關係。是基於在安定中求變始能有成的律則，戈氏的失敗不僅埋葬了蘇聯，也中了美英列強的圈套，等而下之到今年初俄羅斯被迫接受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銀專家所謂「震撼療法」的經改措施，可說是完全罔顧須先建立制度和市場體系始能有效變法改革這一事實，對過程和條件養成等經濟改革前提不加思索，反而企圖一步到位完成西化，這一方法不啻是一帖毒藥。

王兆徽先生：東歐的民主化、政治改革，受戈巴契夫「改造」思想與行動（撤軍行動）的影響極大。初期如波蘭、南斯拉夫無論在政治、經濟都有某種程度的成就，給人一種前途充滿光明的錯覺。

在波羅的海三國獨立之初，戈巴契夫本想用主權國家聯合的方式來整合瀕臨瓦解的蘇聯，但多數共和國均不願參加，主要的是民族分離主義作祟。一九九一年八月政變之後，葉爾欽以「獨立國協」方式來整合已解體的蘇聯，但時至今日，仍是貌合神離，尤其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關係更是複雜（如疆界問題、克里米亞問題、黑海艦隊歸屬問題）。

今後少數民族問題在東歐政治上仍將扮演重要角色。因為東歐民族眾多、語言文化亦不同。我們應該積極培養這方面人才。如政大已申請設立俄東研究所，預定八十三年成立。前蘇聯境內有若干回教共和國，使用土耳其語，政大東方語文學系多年來培養了許多這方面的人才，亦可以好好利用。

主席：謝謝各位在今天座談會上提供的高見。在進一步整理後，各位提出的問題與方向，會後可以再作進一步的研究。最後代表本中心謝謝外來貴賓的參加，引言報告人的報告非常精簡，並謝謝國際共黨組對舉辦這次座談會的協助。